



赵和平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敦煌书仪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赵和平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3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ISBN 978-7-5325-5795-0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敦煌学—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7700号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

赵和平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288,000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5795—0

I·2289 定价:3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委会

主 编：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 委：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柴剑虹（中华书局编审）

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郑阿财（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涌泉（浙江大学教授）

邓文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高田时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波波娃（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长期引领着国际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内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多采，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基本始于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学者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学家叶昌炽至酒泉，从汪宗翰等人手中得绢本《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开益经》等，均作了考订，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后来由于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进入，中国敦煌学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而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兴起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起，敦煌学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为止，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学术历程，中国敦煌学界经过最近 30 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中国敦煌学百年研究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出产了一批影响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百年之际，需要对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界的研究工

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利用“985 工程”平台经费资助,邀请中国敦煌学界 30 余位专家,选取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名义,结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敦煌学界研究之参考。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兰州大学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 1400 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起到了引领研究的作用。近年来,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通过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得到了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1985 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 7 万余册,在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研究所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将可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 2010 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 4 人,毕业博士 54 人,14 人晋升教授,其中 5 人任博士生导师,20 人晋升副教授,33 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十余名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两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还为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先后招收的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前后接收学生四十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 2 人,这些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一百二十多项,经费一千多万元,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由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各界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学研究的特殊性质,遵照专家的意愿和实际需要,本丛书论述性著作一般以简体出版,以方便阅读;考据性著作以繁体出版,以避免录文和释文的歧义。由此繁简混合出版带来的丛书格式不统一,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酝酿、发起到实施,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老一代敦煌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很难有这个项目的实施。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该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献,对敦煌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丛书的诸位编委,也为“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劳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学 术 自 述

我出生于农历戊子年(1948)二月二十三日,公历应为4月2日,身份证上从户口簿写作3月12日,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上户口”时的民警同志随便看了当年“月份牌”上农历二月二十三对应的是3月12日而随手填上的吧。祖籍河北完县(今顺平)。

佛教讲“因缘”,国人讲“缘分”,人的一生有许多“因缘”,我与学术的结缘也颇富命中注定的色彩。

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北京宣武区读书,1966年高中三年级准备高考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折腾两年后,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广阔天地里“炼红心”六年,1974年调回北京做中学教师。在年满三十的前若干天,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于1978年3月5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报到,成为北大的一名老新生。抓住这个迟到的机会拼命学习的想法,占据了 my 头脑。

在考古专业学习了一年半,恰逢中国古代史于1979年招研究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考试合格,成为张广达、王兴兴二位先生合招的隋唐五代史方向的研究生。

张广达师家学渊源,并向觉明、邵心恒、邓恭三等先生治学,坎坷的遭遇,反倒使他在扎实的国学基础上具备了掌握多种语言工具、熟悉国内外学术动态的优势,因而能从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中外结合的方法上去处理问题。他特别强调治学要有国际性眼光。

王永兴师是陈寅恪先生嫡传弟子之一,对于隋唐史相关文献及敦煌文献烂熟于心,特别重视对《通典》、《唐六典》、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基本史料的熟悉和掌握,强调对史料的分析与鉴别,他特别推崇寅恪先生能从习见史料中得出新见解的方法。我老老实实遵从师嘱,在三年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认真、仔细地读这些隋唐史的基本文献,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至今记得每周与日本同学木田知生在勾园他的宿舍里共读《唐六典》的情景。

两位老师治学的路数尽管不同,却都属一流学者,他们的言传身教将我领进了治学之门,使我得以初窥治学之道。

领我走进学术殿堂的则是先师周一良,1983年,机缘来了,经宁可、沙知等先生及同门邓文宽教授推荐,我受命协助一良师整理、录校敦煌本书仪的工作,直至2001年10月先师辞世。十几年中,得以亲聆教诲,享受了别人很少能得到的这样一种“待遇”,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吧!

1980年,我第一次有幸听周一良先生的课,那是在田余庆师开设的“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课”上,一良师“客串”一讲,题目为《〈世说新语〉和刘义庆身世的考察》,这可能是一良师“重理旧业”后第一次公开讲课,我在课堂上认真做了笔记(前两年整理书柜,田先生授课的笔记居然完好如初,令我欣喜),一良师授课中教给我们的两个治学方法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至今不敢或忘。其一,西方人讲读书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译成中文可曰“读书得间”,即从书本的字里行间去探究历史的真相。一良师从《刘义庆传》中“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入手,廓清刘义庆身为宗室,在宋文帝时面临猜忌诛杀的形势下以清淡图免祸的窘境,揭示了号称“元嘉之治”的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加深了对元嘉时政治社会背景的了解。其二,研究历史,要掌握五个W,即Who, When, Where, What, How,一良师讲,这是当年在燕京大学听洪

煨莲先生课时得来的,但他认为还应当加一个更重要的 W,即 Why,就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作出解释,说明它为什么如此,讲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说出了道理,解答了为什么,才能算抓住了历史。

1984 年春天,我去燕东园拜见一良师,请示如何整理敦煌本书仪,从哪里开始,要注意什么问题等。一良师先介绍了一些日本学者研究敦煌本书仪的情况,然后嘱咐我,首先要从全面搜集资料入手,尽可能将书仪写本从大量敦煌文献中挑选出来,然后分类归纳整理,绝对不要为整理而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要先进行个案研究,对每一种、每一类都要深入研究,还其本来面貌,理清源流。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归纳、分析,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找出一些对历史研究有影响的问题。他还嘱咐我要沉下心来,仔细地做整理工作。

此后谨遵师嘱,沉潜于纯学术研究中,个人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好在“回报颇丰”,二十几年来,我已将敦煌本书仪整理成《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两书刊出,虽有“漏网之鱼”,但多为“小鱼”;同时撰写了一批关于书仪研究的有影响的论文,将书仪分型、分类并进行专题研究,具体成果可参见本书所附《赵和平论著目录》,此不赘。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其实辩证地讲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师父领进门”是客观条件,修行则是主观努力,二者缺一不可。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感谢上苍在学术上对我的眷顾,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前辈学者如季羨林先生、潘重规先生、饶宗颐先生、周绍良先生、池田温先生等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指引和提携,同辈学者中,如方广錩、邓文宽、王素、郝春文、郑炳林、张涌泉、黄征、荣新江等及台湾地区的王三庆、郑阿财、朱凤玉、林聪明等,都是我的诤友与畏友;日本的冈野诚、高田时雄、衣川贤次、落合俊典等也给过我很多帮助。有

这样的老一辈学者指点,有一批有志于献身学术的忠实朋友,你便无法在学术道路上退缩。当然,还必须要有耐心与毅力,必须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决心,即是要像古希腊哲学家们一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心态,减少功利心,增加平常心。

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今天,只有甘坐“冷板凳”,才可能“吃冷猪肉”,搞纯学术研究的人,也可以享受精神生活的喜悦。今试举敦煌本整理和研究中的“精神享受”的两例:一次,一良先生嘱我弄清书仪中出现的“单书”、“复书”问题,经过反复思考,认真排比,“天眼忽开”,将“单书”、“复书”搞明白了,得到先生首肯,学术界也无异议,当时心情的喜悦,非笔墨所能形容。又一次,P. 3449+P. 3864 肯定是一种册页制书仪,一良师写过文章,限于当时的条件,对这份册页写本人为扰乱的情况不清楚,引来了旅法学者陈祚龙的批评。后来,我将这两件写本的照片经复印后分剪成70页,在家里地板上玩了三个通宵的“拼图游戏”,终于将其重新拼成一种“刺史专用书仪”。当我极其兴奋地向季羨林先生汇报此事时,季老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这种“享受”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也是学术研究带给我的最高奖赏。

文史研究也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又很不一样。说一样,是必须要以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和平常心态去面对;说不一样,是它很难有所谓的“经济效益”,更难产生“轰动效应”。文史研究要求的仍是一种探求真理,在探求中提高心灵感悟的一种过程。我虽已年过六十,但自觉仍是一名小学生,我会抱着一种对学术敬畏的态度,以平常心走下去。

2010年3月18日草

目 录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1
---------------------	-------

学术自述	1
------------	---

第一编 总 论

敦煌写本书仪略论	3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	39
《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	54
中国家书的源流、体例、礼仪	93

第二编 个 案 研 究

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的整理与研究	103
敦煌本《朋友书仪》与正仓院藏《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的比较 研究	112
武则天时代的一种敦煌写本书仪 ——P. 3900 号写卷的初步研究	147
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	155
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	163
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的再研究	195

晚唐五代时的三种吉凶书仪写卷研究	210
《甘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再探讨	232
《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	243
《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	256
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	
——P. 3449+P. 3864 的初步研究	270
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	
——以 P. 3931 号写本为中心	279

第三编 专题研究

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	303
敦煌写本书仪中的口头用语诸问题初探	317
唐代书仪中所见妇人书札	343
敦煌写本书仪中所看到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	358
赵和平学术论著目录	376
后记	384

第一编 总 论

敦煌写本书仪略论

书仪，是敦煌写本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敦煌文学的重要内容。唐五代时期，士庶之间信函往来颇受重视，因此，出现了一批专供撰写书札时参考的书仪。现在，五代以前传世的书仪十分稀少。据我们所知，流传至今的最早传世作品是西晋人索靖的《月仪帖》。是否出于索靖之手，清代姚鼐曾有怀疑。此帖很可能是唐人摹写。姚氏认为文字亦非晋人所撰，但未举出充分证据，现在看来，文字本身仍当出于晋人之手。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唐人真草两体《月仪帖》（又名《十二月友朋相闻书》，内缺三个月），可能是现今传世的唯一一种唐代书仪。北宋则有司马光《书仪》十卷流传至今。在敦煌写本中，却保存了相当一批书仪，经初步整理研究，大约有百件，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敦煌写本书仪的概况

中外历史学界一般的看法，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出现于魏晋，兴盛于东晋南北朝，衰落在唐末五代。作为士大夫行为规范准则的书仪，与世家大族的命运相表里，亦几乎和世家大族的盛衰相始终。

《隋书·经籍志》仪注类有多种书仪的著录，两《唐书》内著录的书仪，除去南北朝时流传下来的若干部外，唐人著述也只有三五部。宋朝

以后,每况愈下。而唐朝以前系统性、综合性的书仪早已散佚。赖敦煌写本的出现,才使我们看到唐五代时具有不同时代风貌的各种书仪。

百件上下的写本书仪,可分为两种情况,三种类型。一种情况是写本中原有书题或尾题称为书仪的。其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朋友书仪》,类似唐人《月仪帖》,前部是年叙凡例、节候用语,又称“十二月相辩文”,后部是按月编排,每月往复各一通书札,专叙友朋思念渴仰之情,内容远比《月仪帖》丰富;第二种类型是综合性书仪,包括序言、年叙凡例、吉凶往来、公私表疏、婚丧仪礼、门风礼教等内容,现存武则天时期至沙州归义军曹氏时期的残卷有十五六种之多,是最重要的一种书仪。另一种情况是写本没有明确书题,或原书题不称书仪,称《杂别纸》或《记室备要》、《杂谢贺》之类,多数内容为应酬官场中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书、启、状之类范文,少数是友朋往来的书札,据其性质,我们也把它们视为书仪的一种,列为第三种类型。除上述三种类型外,还有一些“释子文范”(如“临圻文”之类)、“结社文”、“放妻文”、“放良文”、“祭文”等,不是专为某人所写,而是提供给人们写上述文体时参考用的范文,似可归入广义的书仪范畴。

第一种类型,《朋友书仪》。写本编号为 P. 3375、P. 2505、S. 5660、S. 6180、S. 6246、P. 2679、S. 5472、P. 4989、P. 3466、P. 3420、贞松堂本、S. 361 背等,上海图书馆也藏有此类写本,惜未得见。这十余个写本,经过整理,可以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全本。据 S. 6180 及写卷内容,我们定名为《朋友书仪》。这种书仪,除“十二月相辩文”外,其余内容与唐人《月仪帖》相近,内容却远较之丰富。多数信札是远在边塞的游子写给中原朋友的,虽属骈文,但文字优美,感情真挚,用典贴切,对仗工整,实属骈文中的上品。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朋友书仪》的撰写年代在唐朝前期,作者可能是高宗朝宰相许敬宗(参见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研究》,载《敦煌研究》1987 年第 4 期,并见本书第 109—